

唐 达 晖

鲁迅前期思想与尼采

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是鲁迅思想研究中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在鲁迅早期著作中，曾多次论及尼采，并给以肯定的评价。早先，刘半农曾赠给鲁迅这样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意谓鲁迅思想中，兼有托尔斯泰、尼采两家学说的影响。据说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恰当，鲁迅自己也不加反对^①。瞿秋白也认为，鲁迅早期思想“倾向尼采主义”^②。此外，还有不少鲁迅研究者，认为尼采学说对鲁迅前期思想是有影响的。但是，如所周知，尼采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鲁迅又是怎样受他影响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多年来众说不一。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人指出了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和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研究鲁迅思想体系的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这问题正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上被解决着。

有人把尼采主义和鲁迅的初期思想放到平行的地位，他们认为初期的鲁迅以尼采的思想为血肉。

但是另一部分的人却提出了与这不同的意见，他们以为，鲁迅只受到尼采的一部分影响，这是因为在“五四”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工农大众还没有成为社会政治舞台的主角，当时还没有正确的集团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输入到东方来，使鲁迅不得不拿尼采学说作为斗争的工具。其实鲁迅的初期思想和尼采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把他们放在平行的地位。^③

这里归纳的两种不同观点，大致反映出了当时讨论中的主要意见。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把鲁迅前期思想和尼采主义相提并论了；但是，鲁迅究竟有没有受尼采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影响，却还是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一

尼采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末叶的德国，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和阶级根源的。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尼采(1844—1900)出世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正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时候。尼采的著作生涯，开始于一八七一年，而主要著作活动时

期，则是在八十年代前后。其时，德国资本主义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尼采主义的出现，就是德国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把意志作为世界的本源。但两人也有不同。叔本华视人生为一大悲剧，认为意志不能满足，便生痛苦，要得到超脱，只有弃绝欲念，否定生存意志。尼采则不然，他认为“生命是欣喜的源泉”^④。他所说的意志，不是生存意志，而是权力意志。他说：“凡有生命，便也有意志：但不是向生命之意志，却是……向权力之意志！”^⑤他把权力意志当作自然和社会进化的动力，也是唯一的价值标准。发扬追求权力的个人意志，扩张自己，征服他人，是人的本能和幸福的来源。不言而喻，能获得这种幸福和满足的，只能是强而有力的人，决不是所谓“损伤了胃”的弱者^⑥。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是建立在这种主观唯心论的哲学基础之上。

什么是超人？尼采说，人类走过了从虫豸到人的路，遵循权力意志的法则，还要进化到超人；“人”不过是连结禽兽和超人的桥梁。这些渺茫的说法，虽然蒙着“进化”的外衣，然而，就其实质来看，他所视为“人类的将来”^⑦的超人，并不是生物学上的新物种，而是权力意志的化身。超人“不是凡人：不是邻人，不是穷人，不是苦人，不是好人”^⑧，实际上就是所谓“新贵族”，“世界的主人”，君临于大众之上的统治者。所以尼采直言不讳地说：“上等人是非人和超人”^⑨；“最高的人也应该是地球上最高的主宰”^⑩。

尼采对他生活的时代强烈不满，甚至认为现代社会“一切皆值得毁灭”^⑪。他猛烈抨击现有宗教、道德、法律，要求“毁灭老的价值和标榜”^⑫，重新估价一切。十八世纪启蒙学者以“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⑬；尼采则否定理性，宣称“真理的标准就在于提高权力感”^⑭。他反对民主，蔑视和仇视人民大众。他崇拜英雄而反对多数，拥护贵族统治，宣扬“人是不平等的”^⑮，呼吁“重新恢复等级制度”^⑯。

尼采认为有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一种是“主人道德”，一种是“奴隶道德”。前者以尊强锄弱为善，后者以扶弱抑强为善。尼采主张前者，认为它使人类向上，是走向超人的途径。他宣扬人类的第一条原则是“柔弱的拙劣的人应该死亡”，同情和怜悯弱者就是违背自然法则，攻击基督教“是自然选择的原理的仇敌”^⑰，现在的正统道德是“阿芙蓉似底道德”^⑱。应当指出，尼采的“超道德”或“非道德”原则，只适用于“强者”，而“不是一切人的法则”^⑲，它意味着唯有统治者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规范和社会义务的约束而凭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尼采虽然抨击宗教、道德，但又认为在强者和主人手中，“宗教是一种增加权力克服抵抗的方法”^⑳。

联系所处时代来考察，不难看出尼采主义的阶级本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在欧美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了。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尼采以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敏感，深刻意识到这种矛盾和危机，预感到战争和革命的威胁。为此，他呼唤新的统治者——超人。他要求重新估价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用新的思想体系代替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来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传统，以便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给资产阶级以再武装。他的学说被称为贵族主义，实质上是反映了当时正在诞生中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唯其如此，尼采学说才会成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

二

在中国，最早介绍尼采的大概是王国维。一九〇四年左右，他就著文评介了叔本华和尼采，论证了尼采超人哲学“不外以叔氏之美学上之天才论应用于伦理学而已”^②。

二十世纪初年，鲁迅去日本留学。其时，“尼采和易卜生循着日本资本主义的破绽，……在日本风行一时”^③。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接触到尼采的著作。据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④“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厨里，……”^⑤郭沫若认为鲁迅与王国维“都喜欢文艺和哲学，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过尼采”^⑥。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

怀着强烈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鲁迅，之所以会对尼采感兴趣，是与他当时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有关系的。

鲁迅早期的世界观，是以进化论为基础。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指一九〇七年前后），相信精神革命，主张个性解放，简直是浪漫主义，也还是进化论的思想。”^⑦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就中国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进行过一场大论战。这次论战，对鲁迅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痛斥闭关自守的封建顽固派，抨击洋务派和改良派，表现了鲜明的革命立场。

但是，鲁迅的思想观点也有与一般革命派不同之处。他并不认为革命的目标仅仅是推翻满清，也不认为革命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完全走西方的路。正如列宁所说，中国人“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⑧。鲁迅的认识虽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他已经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认为如果把“已陈旧于殊方”的资产阶级文明照搬过来，势必会使西方社会的弊害，再现于中国，“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⑨。因此，他的文章也尖锐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不过他当时并没有象孙中山一样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⑩的设想，也没有为未来中国设计一幅具体蓝图。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他更注意的是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他相信改造中国的根本之道，“首在立人”，即实行精神革命，从改造国民性着手，使一盘散沙似的中国，变为“人国”。他认为这比汲汲于追求西方“肤浅凡庸之事物”要紧得多。

用什么来改造和武装中国人的思想精神呢？“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⑪中国固有文化长期受封建主义禁锢，早已与世界潮流隔绝，因此必得“别求新声于异邦”。而追溯西方文明演变史，则又看到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已趋于没落，唯有十九世纪出现的“神思一派”，放出了异采。鲁迅认为这一新思潮的出现，是“将来新思想之联兆，亦新生活之先驱”，很可能取代现有西方文化而成为二十世纪新文明的思想基础。在这一“新宗”中，尼采是有代表性的，他的“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所以鲁迅对他也特别注意。

鲁迅为什么要推崇这一流派，为什么要把尼采看作新思潮的代表呢？

第一，鲁迅用进化论看问题，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文化也是随时代而

演进的。“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原来是为了对抗封建主义而产生的，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但它本身也有偏颇。随着时间的推移，“洎夫末流，弊乃自显。于是新宗蹶起，特反其初”，所谓“神思一派”就应运而生。它“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合乎人类文明演变进化的规律。

第二，鲁迅因为憎恶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诈伪罪恶”，所以赞许尼采对现代社会和文化所持的否定批判态度，说他是“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鲁迅指出，西方社会醉心物质生活，人欲横流，“社会憔悴，进步以停”；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扼杀个性，摧残天才。他认为这是西方社会两大病根，因此尼采一流的个人主义和非物质主义，就是对症的“药石”。

第三，鲁迅相信进化论，同时认为尼采的超人学说，是“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与进化论精神一致。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受赫胥黎的影响。赫胥黎认为文明愈进步，则精神道德力量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愈显著，也就是所谓“伦理的过程”取代了“宇宙过程”（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斗争）^③。鲁迅也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认为必须“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才能推动文明进化。鲁迅赞许超人，因为他所理解的“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就是在精神和才智方面高度发展的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鲁迅对尼采等人的肯定，是同他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他当然没有看到尼采哲学恰巧是资产阶级文化进入腐朽阶段的典型产物。）鲁迅揭露西方文明，又是为了揭露批判洋务派、改良派的谬论，并且破除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力图为中国社会找出一条新的途径来。他认为可以借尼采一派的“主观与意力主义”，启发国人自觉，发扬“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精神，以打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交织而成的精神网罗。因此，鲁迅在一九〇七年前后写的这些文章，在当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但是，鲁迅把所谓“神思宗”——实即主观唯心主义一派，当作新生力量的代表，却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评价，当然不能不对他自己的思想产生影响。其实被鲁迅列入这一流派的一系列西方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思想和历史作用，也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在鲁迅看来，反对现有文明，尊重个人，推崇主观，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鲁迅是这样理解他们的，也是从这几方面接受他们影响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当时提出的“重个人，非物质”的思想纲领中。

在这里，有必要先谈谈鲁迅这一思想纲领的真实含义。所谓“重个人，非物质”，其实质就是个性解放和精神革命。鲁迅当时所提的个人主义，不是通常所谓“害人利己之义”，而是指的“尊个性而张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称尼采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赞扬“尼佉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鲁迅认为，要使中国人民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二患交伐”中解放出来，就非发扬个性，解放思想不可，个性解放是精神革命的必要途径。

“非物质”是精神革命的另一面。鲁迅是重视科学的。他称自然科学为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说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可见他的“非物质”，不是一般地否定物质文明，而是反对带着资产阶级铜臭和血腥的物质生活，反对“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扼杀精神生活的偏向；同时也反对当时有些人对西方物质文

明的实用主义态度，“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所以“非物质”的要旨仍在于“张精神”。

应当看到，鲁迅主张精神革命，主张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思想启蒙，这在当时的民主革命中，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时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忽视了的课题。鲁迅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意即从个性解放入手，实现群众的普遍觉醒，最后求得大众的解放。这正是他的为大众的革命立场的表现。但是，早期鲁迅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就不能不是基本上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这样，虽然他在阶级立场上与尼采有根本的区别，而在思想上、世界观上，还是有受尼采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可能性。他对尼采等人的评价，他的“重个人，非物质”的思想，都反映出了唯心主义观点。

一切唯心史观，都不能从物质生产方面去说明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鲁迅当时过于强调了精神力量的作用。他虽然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却没有从经济制度上去找根源，反而把尼采等人的意志主义当作救治时弊的良方。这就是把精神方面的东西，当作了决定的因素，病源和药方都没找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提倡精神革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没有抓住根本问题，所以他的主张，仍不免带有空想成分。

同时，鲁迅还不理解思想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还不能明确认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他虽然抽象地提出了文化发展上的新陈代谢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文化演变同政治的关系，但还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考察，因而不能从本质上去分辨新事物与旧事物，这样，才会把尼采学说误当成新生事物。这也是他的进化论思想的局限性。

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鲁迅早期过于强调了个人的作用。他一方面认为必须有广大群众的觉醒，中国才能变成“人国”；一方面又存在怀疑群众的倾向，过低估计了群众的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于群众。鲁迅希望通过最早觉悟的分子来唤起群众，这是对的；但片面地“重个人”，而认为“是非不可公于众”，“唯超人出，世乃太平”，把历史进步寄托在少数人身上，则明显地是受尼采影响。

上述几方面，说明鲁迅早期思想和尼采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等同起来，也不是说鲁迅早期思想就是以尼采主义为基础。因为鲁迅与尼采，不仅在政治上有根本区别，就是在世界观上，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上，也是有重大区别的。

首先，鲁迅的基本思想是进化论。虽然进化论作为历史观，是唯心的，给鲁迅思想带来了局限性，但它在当时对鲁迅“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②。尽管尼采也标榜进化，尽管许多人也以为超人哲学是进化论，但尼采的“权力斗争”说，其实是对达尔文学说的歪曲，也是与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大不相同的。鲁迅驳斥“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虽不是直接对尼采而发，实际也是批判了他的。不仅如此，尼采既宣扬“我们的路是向上的”，退化是“最坏的事”^③，又宣扬历史“永恒循环”论，说“一切事物永远重还”^④。这种历史倒退论，更是和鲁迅的思想背道而驰的。这说明，鲁迅的进化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奋起图存的决心和愿望，是进步的、向上的。尼采学说则代表着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本质上是反动的、倒退的，充满矛盾的。

其次，鲁迅早期世界观，有唯心论成分，也有唯物论成分。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鲁迅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生物发展，“无不能铨解以自然之律”，进化论就是人们对这种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人的头脑臆造出来的。在谈到某种文学倾向时，他指出并非作家们“独凭神思构架而然”，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的产物。这种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由此可见，鲁迅的世界观，与尼采那种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⑤的主观唯心论，是不同的。

再次，鲁迅的个性主义，无疑具有尼采思想的某些因素，但同时应当看到，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就提倡意志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了，到启蒙运动时期，又进而发展为“人权天赋”的思潮。鲁迅推崇“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基本上属于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哲学，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但由于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在性质和历史作用上就有进步与反动之别。“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尼采学说，是反民主，反人道主义的。鲁迅没有看清这种区别，而把尼采的某些观点吸取过来，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了。但如果仅仅认为他的个性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尼采的‘重个人轻物质’的学说”^⑦，那是不够确切和全面的。鲁迅在谈到拜伦的作品时说：“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这种不同，在于拜伦继承了民主主义思想传统，在作品中反映了对黑暗势力的反抗；而尼采则十分敌视民主传统，认为它妨碍了权力意志的发展，因而鼓吹强权。鲁迅无疑是更倾向于拜伦的。这也说明他的个性主义与尼采有实质性区别。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鲁迅早期思想，是在中国旧民主革命高涨时期形成的，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意愿，因此，从产生背景和阶级根源来看，与尼采思想根本不同。正如瞿秋白所说：“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⑧就思想本身来说，鲁迅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世界观，也不同于尼采的唯意志论的思想体系。不过鲁迅早期世界观是复杂的，在社会思想方面，基本上属于唯心史观范畴，这就是他得以接受尼采某些影响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对于尼采给鲁迅的影响，也要具体分析：一方面是鲁迅对尼采主义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评价，接受了他的某些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尼采的意志主义，又被鲁迅加以改造，利用来作为反帝反封建和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武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各种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出现了如鲁迅所说的“大谈尼采”的现象。尼采在中国，也和西方一样，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毁誉不一。例如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就批驳了尼采的道德论，说欧战的发生，“皆此等学说为之厉阶”^⑨。随后，蔡元培也指出，“统观战争时代的德国政策，几没有不与尼氏学说相应的”^⑩。一九二〇年《晨报》曾连载长篇译文，比较详细地介绍尼采^⑪。同年《民铎杂志》二卷一号，是尼采专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尼采作了较为系统的评介，从总的倾向来看，是肯定尼采的居多。如认为“尼采学说之真价，实开近现代哲学之先河”^⑫，或认为尼采思

想可以救正我国人“卑屈之懦性”，说对尼采的攻击，都是由于没有了解他的思想“究竟”^④。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也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新起点。尽管他当时对社会主义革命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理解，但已看到“‘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而不再把尼采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当作新时代的思想先驱了。如果说鲁迅早期由于“浓厚地带着浪漫主义的风味”而“喜欢尼采”^⑤，那么，“五四”以后他的走向现实主义，也使他不象以前那样倾向尼采了。但这时他对尼采的兴趣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九一八年，他曾用文言翻译了尼采《苏鲁支语录》的前三节（题作《察罗堵斯德罗绪言》），一九二〇年又用白话将序言全文译出（题作《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在一个时期的鲁迅作品中，仍然反映出尼采的某些影响。日本友人增田涉甚至认为鲁迅这时的“随笔里多半可以窥见尼采的面影”^⑥。

一九一八年鲁迅发表了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后来他曾谈到狂人说的关于人和虫子的一段话，来自《苏鲁支语录》。鲁迅借用尼采的话，表达自己的意思，希望人类脱离野蛮蒙昧状态，进化成为“真的人”。他说过：“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所以，在人类应该“超过自己”，进化到比现在更高的阶段这一点上，鲁迅是同意尼采的。不同的是，尼采其实是要造就一小撮新的统治者；而鲁迅所期待的，是人类普遍的进化，使将来的世上，没有“吃人”的人存在。这就是两者思想和立场的差异。对于这一时期作品中所说的“真的人”，“觉醒的人”，“完全的人”，鲁迅自己后来作过解释：“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认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这种观点虽然不脱人性论的窠臼，但它所扫荡的是封建主义的“成法”，因而有现实的革命意义，“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了。

同年，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中写道：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乍看起来，鲁迅是在反对尼采。但细察文意，实不尽然。文章的主旨是：“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等他翻了，再帮他抬，反更有益。可见他并不是无条件地赞同耶稣的办法。尼采说：“凡落下的，也应该再加以推倒！”^⑦鲁迅固然不赞成对弱者落井下石，但倘若落下的是反动腐朽的事物，那是“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据说鲁迅就常常称述尼采的车要倒了推它一把的话^⑧，这当然是从排击旧物，催促新生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的。

“五四”时期，鲁迅站在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发扬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他认为“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为了彻底摧毁旧思想旧文化，他同早期一样，推崇尼采、易卜生诸人“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号召人们学习他们的精神。

鲁迅认为尼采一类破坏者之可贵，还因为他们同时是革新者。破与立是辩证的关系。鲁迅既提出了“无破坏即无新建设”的彻底革命思想，同时又指出“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破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因此值得赞扬的，不是“寇盗式的破坏者”，而是“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坏者”。这里要补充说明：早在日本时，鲁迅就肯定尼采有理想，有信仰，说他反对基督教，提倡超人，是“易信仰，而非灭信仰”。鲁迅当时强调，人必须有坚定的信仰，“不随风波”。这一主张，是和他的申张个性

的思想一致的。要指出的是，鲁迅早期提倡独立自信的民族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对于理想、信仰，不作阶级分析，抽象地一概加以肯定，则是不合乎辩证法的。后期的文章，例如《且介亭杂文·运命》中，指出并不是凡有信仰都是好的，对信仰要作具体分析。这样看问题，就没有片面性了。

除了直接称引尼采的处所之外，鲁迅前期作品中，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发现尼采影响的某些印痕。例如，在“五四”前后鲁迅杂感中有些关于对群众的看法，就没有根本改变早期的观点。象《热风·随感录三十八》所谓“个人的自大”与“合群的自大”，所谓“对庸众宣战”，这些提法也还是尼采式的个人独异思想的表现。尼采认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④。“合群的自大”就是指群众的愚昧而高傲。鲁迅当时仍是只把希望寄托在少数觉悟了的知识分子身上，这是他的历史观的局限性的表现。

尼采宣扬“热爱生命”，一再痛斥“来生论者”、“蔑视肉体者”、“死的说教者”，说“超人是土地的意义”^⑤，表现了执着于生活和现实的态度。鲁迅也主张“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尼采攻击愚顽的庸众。例如他指出，人们把“看悲剧，看斗牛，看钉十字架”当作最大的乐事，“倘若伟大者哀呼——：小人物立刻跑过去，舌头垂在嘴下，贪馋地要尝味。”^⑥鲁迅在一些杂文和散文《复仇》等篇中，不是也揭露过这种“戏剧的看客”吗？不过在尼采是表现了对群众的憎恨，而鲁迅则是怀着深广的忧愤，揭出病苦，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类似的例子，是还可以找到一些的。

尼采以“诗人哲学家”著称，善于以诗的语言表达哲学思想。他自称他的书是连峰簇涌的险途，必须有长腿方能跨越^⑦。这样，华美而隐晦的艺术形式就掩盖了思想实质。鲁迅曾称他的文章“太好”^⑧。孙伏园也说鲁迅“特别欢喜他的文章，……说是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声”^⑨。鲁迅那些凝炼精警，蕴涵深邃哲理的杂感和散文诗，在文字风格或艺术构思方面，有时也可以窥见某些尼采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对尼采有兴趣的不止鲁迅一人。一九一九年，茅盾翻译了《苏鲁支语录》中的两章^⑩。一九二〇年又写了《尼采的学说》这篇长文^⑪，相当详尽地评介了尼采的道德论和社会思想。一九二三年，郭沫若着手翻译《苏鲁支语录》全文，后来译到第二部第四章中辍了^⑫。

为什么新文学的先驱们一时间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尼采，这首先要从时代上去找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多数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掌握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他们的世界观往往是复杂的。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但在潮涌而来的西方学说面前，还缺乏科学的辨别能力，为了战斗的需要，只要认为是可以当作武器用的东西，都想拿来。正如周扬所说，“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⑬。

当然，尼采本身也具有某种吸引力。由于他对当代社会和传统观念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由于他那“不同凡响”的哲学体系离开了正统派和学院哲学，因而当他在世时，经常遭受冷遇和非难，他的思想和著作，成了“不合时宜的看法”^⑭。他说，“我是第一个超凡人”^⑮，这固然是他的狂妄，却也表现了他的孤独。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庸俗市侩哲学的鞭笞，有时确也打着了痛处，言辞看起了也很激进。这些现象，曾使他赢得西方一

些进步学者和作家的同情，被看成“精神的革命者”，“第一流的破坏天才”，甚至迷惑过某些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了解了这些，我们对于“五四”时期一些革命作家的赞赏尼采，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任何时代，人们对文化遗产和外来学说的继承和吸收，总是与批判相结合的，决不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五四”时期，尽管革命作家们对尼采思想的阶级本质还缺乏深刻明确的认识，但也看到尼采著作“外观上常见矛盾”^{⑥0}，他的学说“驳杂不醇，有些地方很危险”^{⑥1}。他们是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和各自的理解来宣传尼采的。郭沫若在翻译尼采著作时说：“我是一面镜子，我的译文只是尼采的虚象；但我的反射率恐不免有乱反射的时候”^{⑥2}。可以说，当时读者看到的，都是多少经过改造的“尼采象”，而不尽是尼采的本来面目。郑振铎说：“尼采思想之重要在它的积极建设主张者少，而在它的激动力的伟大者多”^{⑥3}。这也表明人们是有所取舍的。

“五四”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是充满新与旧的激烈搏斗的时代。尼采主要是作为一个叛逆者、反抗者的形象呈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茅盾赞许的是他的“重新估价一切”，说“这样的摧毁传统的道德信条是多少有力”，“所以他的道德论是极有革命性的”，“应当借重来催毁历史传统的、畸形的、桎梏的旧道德的利器，从新估定价值，创造一种新道德出来”^{⑥4}。这正是从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出发来看待和“借重”尼采的。鲁迅把尼采看作“偶像破坏者”、“轨道破坏者”；郭沫若称颂他为“欺神灭象”的“学术革命的匪徒”^{⑥5}，这就是尼采的“吸引力”之所在。事实上，直到三十年代，还有人是这样看尼采，说“介绍或研究尼采亦只能强调了尼采对于时代的叛逆性、革命性、乃至进步性即得”^{⑥6}。

我们还可以从反面来证实上述观点。辛亥革命后，罗振玉劝王国维专治国学时说：“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⑥7}在敌视新文化的国粹家眼里，尼采也是一个旧文化的破坏者，这就无怪乎新文化的拥护者要赞成他了。当然，当时的新派和旧派，都没有认清尼采的本质。

然而，这一切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必然会改变。郭沫若在谈到他的《查拉图司屈拉》终于没有译完的原因时说：“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把我向上看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的距离。鲁迅曾译此书的序言而没有译出全书，恐怕也是出于同一理由”^{⑥8}。正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作家世界观的革命化，使尼采的影响逐渐消失。大革命时期，鲁迅的思想转变加快了步伐，世界观中新的因素日渐增长，更加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他努力探索新的思想武器和“别种方法的战斗”，这就必然导致对尼采思想的扬弃。可以看到，五卅运动以后，鲁迅的文章中就再也没有推崇或肯定尼采的意思了。

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轰毁”了鲁迅原先的“思路”，使他得以实现世界观的质的飞跃。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他生命史上最光辉的后期十年中，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了斗争，也批判了尼采。他的批判深刻有力，三言两语，就刺中了要害。他指出尼采所期待的超人是不会出现的，尼采只有“发狂和死”的下场。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超人哲学。关于鲁迅思想转变和对尼采的批判，这里就不详述了。不过，鲁迅“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所以，在批判尼采思想的同时，他又支持别人翻译出版尼采的著作^{⑥9}。

注:

- ①⑤⑨ 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见《鲁迅先生二三事》。
- ②⑦⑩③⑧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卷。
- ③ 洛蚀文《鲁迅与尼采》，见新中国文艺社编《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此文又收入何典著《文艺漫谈》。
- ④⑤⑥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梵澄译《苏鲁支语录》，生活书店1936年9月初版第65、80、146、217、212、177、84、152、68、16、211、50、158、149、3、156、24页。
- ⑨⑭⑯⑳ 尼采《权力意志》第692、269、544、696节。见《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初版。
-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 ⑰⑳ 转引自符译《尼采之一生及其思想》，《民铎杂志》第2卷第1号。
- ㉑ 《静庵文集·叔本华与尼采》，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14册。
- ㉒ 欧阳凡海《鲁迅的书·走上市民意识的舞台》。
- ㉓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屈原和鲁迅》。
- ㉔④⑦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德文书》。
- ㉕④④ 《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
- ㉖③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触到他自己的谈话之二》。
- ㉗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
- ㉘ 《坟·文化偏至论》。以下所引鲁迅原文，凡出自《鲁迅全集》的，均不再注明，以节篇幅。
- ㉙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上卷。
- ③⑩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篇首引录的这段话，原文见《苏鲁支语录》第3卷第12章。
- ③① 参见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进化论与伦理观》一节及严复译《天演论》卷下《群治》篇。
- ③⑥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页。
- ③⑨ 凌霜《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新青年》第4卷第5号。
- ④⑩ 蔡元培《大战与哲学》，《新潮》第1卷第1号。
- ④④ 《尼采之一生及其思想》、《尼采的超人思想》，分别刊载于《晨报》（第七版）1920年4月15日——6月17日，11月4日——8日。
- ④② S. T. W. 《尼采学说之真价》。
- ④③ 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
- ④⑤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从尼采到海涅》。
- ④⑧⑤⑩③⑧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后附记》，《鲁迅译文集》第10卷。
- ⑤④ 《新偶象》，《市场之蝇》，分别发表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7号。
- ⑤⑤ 《学生杂志》第7卷第1——4号连载。
- ⑤⑥ 题作《查拉图司屈拉》，陆续发表于《创造周报》第1——36号。
- ⑤⑦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 ⑤⑧ 尼采有本著作就叫《不合时宜的看法》。
- ⑤⑨ 梵澄译《尼采自传·非时》，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4月初版。
- ⑥①④④ 茅盾《尼采的学说》。
- ⑥②⑥③ 《雅言与自力》，《沫若文集》第10卷。
- ⑥③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4册《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商务印书馆1927年4月初版。
- ⑥⑤ 《匪徒颂》，《沫若文集》第1卷。
- ⑥⑥ 高寒《〈看哪这人〉译序》，作于1932年4月。引自《看哪这人》（即《尼采自传》）文通书局1948年版。
- ⑥⑦ 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传》，见《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初集。
- ⑥⑧ 三十年代中期，梵澄（徐诗荃）在鲁迅支持下，翻译出版了《尼采自传》、《朝霞》、《苏鲁支语录》。而后，他还译了尼采的《快乐的知识》。